

聚焦话题：中东与国际体系转型

中阿文明交往面临的挑战及对策思考*

马丽蓉

摘 要：中阿文明交往迄今已有 2000 余年历史，形成“官民并举”的一种基本交往态势，在各个历史阶段采取了不同方式，并呈现出不同交往内涵与特征；伊斯兰文明面临的现实挑战主要包括：1. “9·11”事件使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因受连坐而声名狼藉，伊斯兰文明面临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2. 美国借“大中东民主改造”之名进行的文化改造，加重了伊斯兰世界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程度，伊斯兰文明面临如何与怎样融入全球化的现实困境、3. 目前发生的这场内生型的阿拉伯民主运动，实为阿拉伯民族从清真寺走向广场来集体表达民主诉求之举，凸显出伊斯兰文明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自觉意识；为进一步推进中阿文明交往，双方应进一步加强认知、增进理解与沟通，警惕并应对美国互联网外交带来的新挑战，将宗教交流作为深化中阿文明交往的突破口。

关键词：文明交往；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国与中东；人文外交；国际体系转型

作者简介：马丽蓉，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1）02-0010-10

中图分类号：D815.373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属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GJW021）、2009 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09BZX005）、2008 年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8JZD0039）、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和上海外国语大学“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等前期成果之一。

一、中阿文明交往的历史：内涵、方式及特征

目前学界多认为：“文明交往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之内的人与人的社会联系”，亦即“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个体、团体、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物质文明交往和精神文明交往、制度文明交往和生态文明交往……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 and 思想文化等方面，以及和平与暴力等形式的多种交互作用关系。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物质往来，一切群体间的商业贸易、文化交流，各民族、阶级和国家之间和平与战争的关系，总之这些历史上有影响的活动都是文明交往活动。”^{[1]410-411}显然，这是一个包罗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广义概念，但本文主要指狭义的文明交往理念和文化交流实践，集中探讨文化交流、人文交流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交流中具有人文理念和人文精神的交流。

中阿文明交往始于汉武帝时期，迄今已有 2000 余年的历史，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进行具体

交往，最终形成“官民并举”的一种基本交往态势，在各个历史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并呈现出不同的交往内涵与特征。

古代官方层面上的中阿文明交往主要包括：（1）以朝贡方式进行的官方政治交往，为中阿人文交流营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与制度保障；（2）以贡赐贸易、市舶贸易、互市贸易为主的官方经济往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为中阿人文交流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3）双方在政治、经济交往中所推行的相关制度与举措，又带动了中阿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古代民间层面上的中阿文明交往主要包括：（1）阿拉伯传教士与中国朝觐者的宗教之旅，为中阿文明交往夯实了社会民意基础；（2）双方撰写的见闻游记为中阿文明交往提供了史料作证，学术之旅也成为彼此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3）往来于陆、海“丝绸之路”上的中阿商贸之旅，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理念和人文精神，为中阿文明交往提供了原动力。

近现代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均遭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致使两大文明的官方交往严重受阻，但双方社会精英、移民等之间的交往并未中断，政治、外交、宗教、学术、军事、经贸等领域人员往来不断，并留下了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的历史佳话，如在1946年2月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上，叙利亚和黎巴嫩代表对英、法拒绝撤军的控诉，就得到了中国代表顾维钧的支持；抗战爆发后，日寇不断派遣浪人前往各伊斯兰国家活动，歪曲侵华事实以骗取各国同情，达浦生阿訇为此于1937年12月只身赴沙特汉志参加“世界伊斯兰大会”，并在其所撰写的《告全世界穆斯林书》中揭发日寇侵华罪行。与此同时，近代来华的阿拉伯人较少，如1931年长江流域遭受水灾，埃及政府曾派遣两位医生来华救治灾民，归国后在《图画周刊》上发文介绍中国伊斯兰教的情况；1933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选派两位教师到成达师范学校任教；据1930年12月民国外交部公报第三卷第八号：在上海公共租界区，有伊拉克人56名、也门人34名、埃及人12名以及叙利亚人2名。^{[2]218}因此，近现代中阿文明交往呈现出“由盛转衰”的这一基本态势。

新中国成立后，中阿文明交往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20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埃建交的带动下，中阿文明交往呈现出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1、宗教交流对中阿关系发展发挥了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

新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政策，明确了“对外文化交流政策必须与对外总政策相一致，并为其服务”的方针，提出要“进一步开创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新局面。”^{[3]46-47}在此政策的指导下，在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开展的宗教交流对两者关系起到了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4]，特别是埃及于1955年5月派出由宗教基金部长巴库里率领的第一个政府代表团访华，开启了新中国与非洲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友好交往的大门；

2、中阿文明交往频繁、成效显著

在中埃建交的带动下，中阿文明交往日趋频繁（参见下表）：

时 间	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内容
1955年8月	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率团访华，签订“中埃两国政府贸易协定及议定书”，促成1956年初互设商务代表处。
1955年9月	中国选派1名教师和7名学生开始了赴埃前的集训工作，周总理接见并对其出国后学习、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1955年11月	中国和叙利亚签订贸易协定。

1955年12月	中国和黎巴嫩签订贸易协定，规定双方互设商务代表处。
1956年1月	中国驻埃及商务代表处成立，同年2月，埃及驻华商务代表处成立。
1956年1月	新中国首批赴埃师生和商务官员到达埃及，中国驻埃商代处正式成立，8名中国师生也开始了在埃及的工作和学习。
1956年2月	埃及驻华商代处在北京成立，同时派4名埃及人来华学习和交流。
1956年2~4月	中国政协副主席兼中国伊斯兰协会会长包尔汉率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80余人访问埃及，双方签订了“中国埃及文化合作协定”，沿途顺访了苏丹、埃塞俄比亚、叙利亚、黎巴嫩等国。
1956年3月	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率团参加开罗博览会，并进一步落实购买埃及棉花等事宜。
1956年4月	中国与埃及签订两国文化合作协定。
1956年6月	中国和叙利亚签订文化合作协定。
1956年9月	中国在贝鲁特设立商务处。
1956年10月	“埃及在华艺术展览会”在中国举行，影响甚大。
1957年12月至1958年1月	也门王储兼副首相巴德尔访华，双方签署中也友好条约、通商条约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1958年1月	中国和也门签订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商务条约。
1958年9月	中国和突尼斯签订贸易协定。
1958年10月	中国和摩洛哥签订贸易协定。
1959年1月	中国和伊拉克签订贸易和支付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1959年4月	中国和伊拉克签订文化合作协定。

3、中国积极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

因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欺凌的相似经历和在反帝、反殖问题上的一致立场，中国对阿拉伯民族解放斗争予以大力支持，尤其是对巴勒斯坦民族独立斗争的长期支持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政府坚定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事业的一贯立场。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阿建交第二次高潮的出现，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化交流与合作协议，标志着中阿文明交往进入第二个历史新阶段，主要特征为：

1、“五项原则”和“八项原则”成为处理中阿关系的行动指南

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阿文明交往进入滞缓期。从外部因素看，主要是当时美国、苏联对中东国家的控制，渗透干扰了中阿关系的正常发展；从内部因素看，中国与埃及等国家因内部失误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导致中阿关系的发展受挫。1963年12月至1964年1月，周总理访问了亚非国家，并先后提出“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对中阿双方消除误解，并使中阿关系重归友好交往的历史轨道均发挥了重要

作用。

2、阿拉伯国家对中国成功重返联合国功不可没

伴随中国对外交往逐渐恢复正常，中阿文明交往也步入正常轨道，特别是在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重大问题上，赢得绝大多数阿拉伯、非洲国家的理解、支持和鼎力相助，为此毛主席感慨说：“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3、中阿文明交往进展缓慢

由于“文革”给中国外交带来的灾难性冲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阿文明交往成就并不显著，中阿双方主要签订了一些文化、经济技术协定，中国穆斯林朝觐也严重受阻，从1955~1964年间，中国伊斯兰协会共组织朝觐10次，人数132人次。但在“文革”期间，朝觐活动陷入停顿，直到1979年10月，中国穆斯林在中断14年后才首次恢复了朝觐活动。

20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外形势均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中国外交政策调整为“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5]28}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推进与阿友好关系，并迎来中阿第三次建交高潮，同时也极大推动了中阿文明交往，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阿文明交往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1、双方签订了一系列人文领域的合作协定

从1981年5月至1998年12月，中国政府与阿拉伯国家签订双边的人文协定多达20余项，平均每年就达成1~2项协定，直接带动了中阿文明的交往实践；在2001~2004年间，中阿又签署了一系列人文协定和年度执行计划，如中国与也门2001~2003年教育、体育及医疗合作协议，中国与巴林2002~2004年文化合作执行计划，中国妇联与巴林妇女最高委员会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华全国青联与卡塔尔青年总局合作协定等，推动了中阿不同领域的人文交流与合作。

2、中阿高层互访、人文交流日趋增多

为消除“文革”对中阿关系的消极影响，中国政府开始对阿拉伯国家展开首脑外交，并组团出访阿拉伯国家，直接推动了中阿文明交流与合作，如1986年3月17日李先念主席访问埃及，1989年12月下旬杨尚昆主席访问阿联酋、科威特、阿曼和埃及，中、科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此外，2001年6月人民网正式开通阿文网站，2002年4月马海德医生铜像揭幕仪式在其故乡黎巴嫩哈马纳镇举行，2004年中国在开罗举办“2004年中国教育展”等。

3、中阿文明交往开始向制度化和机制化方向发展

在1991~1999年间，中国先后成立了中国—埃及、中国—叙利亚、中国—苏丹、中国—沙特阿拉伯等友好协会，2000年成立了中非合作论坛，2001年成立了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等。

4、中国穆斯林朝觐规模扩大成为中阿文明交往的新亮点

自20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陆续开始安排自费朝觐和利用探亲机会朝觐，并在中沙尚未建交之际，中国以朝觐代表团的方式实现了对沙特的访问，中沙建交更为中国穆斯林朝觐提供了便利，中国朝觐人数呈逐年激增态势。“应该说，中国穆斯林通过朝觐活动对增进中沙相互了解、加强友谊、加速实现关系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6]164-166}

自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阿文明交往在正规化、制度化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并在论坛框架下确立了“中阿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框架，极大地推进了双方政治、经贸、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多边合作，并建立了部长级会议、高官委员会、企业家大会、专题经贸研讨会、能源合作大会、文明对话研讨会、文化交流、高教与科研合作、新闻合作论坛、环境保护合作、人力资源培训以及民间交流等12个合作机制。^{[7]1}其中，关涉人文交流的合作机制多达7个，为中阿双方开展行之有效的文明交往提供了制度保障，中阿文明交往呈现出“积极、

有序、活跃、持久”的总体态势，主要表现为：

1、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的中阿文明交往日趋理性与规范化

自2005年起，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以每两年互办方式举行了三届，围绕相关议题展开讨论，提出政策建言等；在论坛框架内开展了丰富的人文交流与合作，设立孔子学院（课堂）和中国文化中心、举办各类阿拉伯官员研修班和技术培训班等；自2006年起每两年召开的中阿友好大会已举行了三届，并就经贸、文化、教育、地方政府等开展进一步交流与合作达成共识。

2、中阿合作论坛对推进中阿文明交往向纵深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论坛建立以来，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各领域的对阿人文交流与合作；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中阿友好协会、中国伊斯兰协会等开展的对阿人文交往取得了长足进步，为落实论坛行动计划发挥了特殊作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又为中阿文明交往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加深了中阿社会精英、青年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未来的中阿文明交往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总之，从古代沟通东西方的海、陆“丝绸之路”，到近现代民族解放时期的互相同情与支持，再到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全方位合作，中阿文明交往始终体现了和平、互惠与包容的基本特征与历史经验。其中，和平性是贯穿中阿文明交往的核心特征，互惠性凸显于双方经济的巨大互补性和广阔发展前景上，“求同存异”已成为中阿文明包容性交往的行为准则、“文明差异可转化为文明交往动力”则成为双方的重要共识。

二、中阿文明交往的现实：挑战、成因及影响

冷战后尤其是“9·11”事件以来，伊斯兰文明面临诸多的现实挑战，并集中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9·11”事件使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因受连坐而声名狼藉，伊斯兰文明面临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9·11”的爆发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亨氏认为“儒伊文明的联手将是世界最大的威胁”，“黄祸”与“绿祸”为美国所面临的“潜在的敌人”与“现实的敌人”，并判定“文明冲突”的主战场在阿拉伯—伊斯兰地区。^{[8]282-283}但事实上，“9·11”不是一场西方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间的“文明冲突”，而是由西方政客、学者和媒体共同经营的霸权语境中的一场“文明冲突”。“9·11”事发当日，美国总统布什就将之定性为“恐怖主义的战争”，西方媒体又在圣地、《古兰经》及先知等敏感事件的报道中，大肆炒作“伊斯兰恐怖论”，使全球穆斯林处于“被审”窘境，“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全都处于防御地位，以色列则成为这些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它把‘9·11’事件、恐怖主义同在阿拉伯国家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利用不幸的偶然性，用错误的思想说服世界，将恐怖主义归咎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将合法自卫与侵略别人，将民族解放运动与恐怖主义活动，将为正义献身与恐怖主义行动混为一谈。”^{[9]68}对此，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9·11”事发五日就警告“美国及其盟国必须谨慎从事，不要把这项新政策表现成是西方同伊斯兰两种文明之间的一场冲突。”^[10]印尼副总统哈姆扎·哈兹也于同日告诫美国在其反恐运动中“不要把伊斯兰教当作替罪羊”，日本学者呼吁“应站在世界的角度，对穆斯林及其社会采取公正的对策，减少作为恐怖活动的源泉的敌意。如果很多伊斯兰教徒都认为实现了公正，那么，恐怖主义组织就会失去支持，从而自行消亡。但是，如果以不特定的伊斯兰教徒为对象展开战争行为，那么，敌意唤起敌意，文明的冲突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就会增大。”^[11]但是，小布

什政府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悍然发动了两场复仇战，并对大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以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结果，美国在中东深陷恐怖泥潭而难以抽身，哈马斯等伊斯兰激进主义却最终“劫持了民主”，中东穆斯林抵抗美国军事侵略、经济制裁和民主改造的斗争也演变为排他主义的暴力倾向，伊斯兰复兴运动走向了伊斯兰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是积极寻求变革还是“以暴易暴”的抵制与仇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现实挑战，伊斯兰文明也面临“十字路口”的历史抉择。不过，伊斯兰世界也出现了谋求和平与对话的呼声，如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建议联大将 2001 年命名为“文明对话年”，约 50 位阿拉伯学者受联合国和阿盟的委托，相继发表了 3 篇《阿拉伯国家人文发展报告》，积极探索伊斯兰文明的发展出路。

二、美国借“大中东民主改造”之名进行的文化改造，加重了伊斯兰世界在全球化中被日益边缘化的程度，伊斯兰文明面临如何与怎样融入全球化的现实困境

全球化，通常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并形成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基本发展格局。但是，美国等西方大国却倚仗其雄厚实力将自己的“普适价值观”向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强力倾销，其政治意识、经济理念和文化观念所形成的文化霸权思想渗透甚至充当着全球文化认同，西方文化霸权的实现就是一个赢得全球价值共识的过程，亦即推行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的认同过程，全球化也就变成了西方化甚至美国化。其中，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改造”即为明证：“如果说美国实施该计划的公开目的是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社会，那么其背后的目的主要是：改变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的结构以及这个地区人民的思想；播种思想和经济自由化哲学的原则和价值观；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服务，其利益只有通过民主模式来封锁对美仇恨和憎恶的根源才可能得到保证；在战略上为以色列服务，使之成为这个地区的一部分。”^[12]正是由于“西方文化霸权的扩张，使得伊斯兰世界自近代以来所面对的异质文化的压力进一步加重，诱发了伊斯兰社会的认同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合法性危机、精神危机等一系列危机。”^[13]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才出现了以强化文化认同来应对、抵制美式全球化的抗拒行动甚至恐怖事端，“9·11”事件就是弱势文化反抗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种极端宣泄，而伊拉克的教派冲突、巴基斯坦的“红色清真寺风波”以及巴勒斯坦难民营中的“圣战者”等，都折射出中东穆斯林在全球化中被日益边缘化的窘境与挣扎，伊斯兰文明面临如何与怎样融入全球化的现实困境：在全球化时代，宗教、民族、国家乃至区域认同等均受到全球认同（实为西方/美国认同）的极大冲击，拉吉尼·科撒里在《未来的足迹：当代世界的特征及替代设想》中曾提议：“世界上弱小国家之间有必要进行更大的区域合作，集中它们的经济、政治与军事资源，以此为基础进入世界权力结构，并最终打破由一小撮国家支配世界的体系。”^[14]作为全世界 15 亿穆斯林共同的历史传统、精神信仰、价值判断和生活方式的信仰体系，伊斯兰认同更直接影响到伊斯兰世界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甚至成为一些国际与区域合作组织的精神纽带，如在中亚五国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形成的伊斯兰合作圈、伊朗提出的“穆斯林共同市场”，土耳其构设的“泛突厥联盟”、巴基斯坦筹划的“伊斯兰新月区”、伊斯兰会议组织、世界穆斯林大会、阿拉伯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均烙有鲜明的伊斯兰认同的印记，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也因过于强调伊斯兰认同而使自己陷入被边缘化的困窘之中。因此，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借助国际与区域组织的沟通桥梁，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发展中寻求区域共识的认同空间，力争找到一条适合伊斯兰国家国情的发展道路，进而推动伊斯兰文明早日融入全球化。

三、目前发生的这场内生型的阿拉伯民主运动，实为阿拉伯民族从清真寺走向广场来集体表达民主诉求之举，凸显出伊斯兰文明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自觉意识

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具有双刃性：“一方面，它能迅速扩展繁荣和稳定；另一方面，它

也会迅速将贫困和动荡传播到全世界。对于应对和影响外部环境能力较强的发达国家，全球化提供了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有利条件，意味着进一步占有世界的资源、市场并取得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而对于欠发达甚至比较落后的国家，全球化既是借以实现经济繁荣的机会，更是遭受灾害、危机和导致多种矛盾激化的根源。”^{[15]75}对身处边缘劣势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而言，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第一，随着市场自由化、工业私有化，国家支出削减以及通货膨胀，改革就容易破坏当地经济的稳定；第二，经济改革旨在与外国资本和全球市场接轨，随之而来的自由化除了直接影响经济生活外，还将使穆斯林社会遭受市场文化以及个人主义和消费至上主义的全面冲击。”^{[16]94-95}而且，“由于中东现代化是在社会远未实现文化自觉的情况下在外部压力下仓促而起的，社会民众缺乏传统与现代化冲突的心理准备及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从而在社会文化和精神心理危机中诉诸于文化寻根，这也正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文化表达。”^{[17]359}目前阿拉伯国家相继发生的政治动荡，实为一场内生型的阿拉伯民主运动，是阿拉伯社会精英弘扬伊斯兰的“创制”（与时俱进地贯彻伊斯兰精神）传统，在“伊斯兰中间主义”（倡导中正、和平的伊斯兰文明观）思潮的影响下，从清真寺走向广场来集体表达阿拉伯民族的民主诉求之举，“伊斯兰因素”又一次成为阿拉伯—伊斯兰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精神资源：伊斯兰教提倡公正、公平原则，要求“代治者”应“信道”与“行善”，“劝善诫恶”是每个穆斯林的基本功修，反对世袭制并主张利用“舒拉”（民主磋商）制来实现穆斯林的民主诉求。其中，始自阿拉伯部落游牧社会的舒拉制日臻成熟，且演变为阿拉伯—伊斯兰地区传统的民主制度，并从部落首领家转至清真寺直至现在的广场，折射出阿拉伯—伊斯兰民主从思想到制度直至实践的基本特征，尤其是穆斯林的易被动员性又赋予伊斯兰文明极强的社会整合力，能“把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不同职位、不同思想风尚、不同政治态度、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年龄的人紧密地‘粘合’在一起，成为具有共同信仰、共同崇拜对象、共同组织形式、共同教义和教规、共同礼仪和活动方式的社会实体和力量。”^{[18]4}但是，当“和平与发展”的国家认同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难以实现时，探寻跨民族、宗教和地区的全球认同及其实现途径，则成为中东穆斯林改变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这一现实困境的必然选择，凸显出伊斯兰文明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自觉意识。

在伊斯兰文明面临三大现实挑战的同时，中阿文明交往也受到较大影响与冲击，并面临一些需经双方努力予以克服的障碍性因素，主要包括：

1、彼此的认知和理解尚待加强

由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国际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中阿双方对彼此的认知和理解均存在一定的偏差：就阿方而言，突出表现为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期望过高，希望中国扮演平衡或对抗美国霸权的国际角色。就中方而言，突出表现为对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文化、战略地位特别是发展现状等，缺乏足够的了解。此外，西方对国际舆论的强势主导地位，也对中阿双方的认知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2、官方交往与民间交往不平衡

目前的中阿文明交往的主体及其途径仍主要以官方为主，民间交往虽有一定发展，但相对中国与欧美和东南亚地区的民间交往，中阿文明交往的发展水平亟待进一步深化与提高。事实上，在中阿文明交往史上，民间宗教交流历史悠久、绵延不断，并在某种意义上对中阿友好关系发展起着基础和引领性的双重作用。因为，只有民间交往的动力不断增强，渠道日趋多样，中阿文明交往才能更具活力与影响力。

3、美国因素对中国中东外交构成新的挑战

当前的美国中东战略重点在于“第一，宣扬、推行美式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第二，通过所谓

‘支持民主’的行动，力图在动荡局势中掌控先机和主动，消解反美力量；第三，通过在中东北非国家扶持新政权力量，维护、巩固美国在该地区的既有利益。”^[19]这势必会激化地区和世界矛盾，中国的中东外交既要避免与相互对立的中东国家纠缠不清，也不希望在中东乱局中让中美直接对抗，更不愿在形势尚未明朗之际作出任何伤及中阿兄弟情谊、有损中阿互利合作的欠妥之举。因此，如何借人文外交来推动中阿文明交往则成为当务之急。

在国际体系转型之际，尽管中阿人文交流与合作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但是，中国愿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与合作的立场态度十分明确，主张“各国应该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坚持平等对话和交流，倡导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使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应该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不能以此为借口对别国内政说三道四，更不能把世界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归因于哪一种文明、哪一个民族或哪一种宗教。”^[20]这为中阿文明交往提供了重要的行动指南，且影响世界文明交往的发展态势与变革进程，将对世界文明交往体系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关于进一步推动中阿文明交往的对策思考

在国际体系转型之际，中阿文明交往将会面临诸多挑战，经受了历史风雨考验的中阿文明交往的前景依然令人乐观，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也是不容回避的，尤其在阿拉伯国家相继发生政治动荡的严峻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推动中阿文明交往，已成为我们必须正视并需尽快解决的难题之一，特提对策性建言如下：

第一，双方都应进一步加强彼此认知、增进相互理解与沟通

随着中阿双方相互依存度的日趋紧密，难免出现了一些认知偏差，如阿方认为中国将取代前苏联成为对抗美国的另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应该帮助它们减轻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的压力、推动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朝着有利于它们的方向发展，并向他们提供更多的资金与技术援助……显然，阿方对中国的这些过高期望已远远超出了中国所能承受的实际，“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在努力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角色，“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既受到中国与世界大国关系的影响，也受到中国与西亚北非地区包括伊朗在内的非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影响”，“不能孤立地研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而是要将这一关系放在全球与地区两个层面考察。”^[21]¹⁰与此同时，中方对阿拉伯部落文化、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伊斯兰教派分化、阿拉伯国家发展模式、西亚北非的国别甚至政治派别研究以及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社会精英、青年群体的生存现状、社会诉求和精神困境等也缺乏足够的了解，存在知识盲点甚至认知偏差，最明显的就是对于近期阿拉伯国家相继发生政治动荡的原因、实质、影响及发展趋势等一系列问题的阐释，多留于现象罗列，鲜有深度剖析与前景预判。因此，中阿双方需进一步加强彼此认知、增进相互理解与沟通，这将有助于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分辨力与决策力，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进而提升中阿文明交往的深度与广度。

第二，双方都应警惕并应对美国互联网外交带来的新挑战

事实上，在当前的阿拉伯国家相继发生的政治动荡中，以“脸谱”、“推特”为代表的西方新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在突尼斯、埃及等国的政治动荡中还参与了动员、筹划、组织、实施等具体过程。目前，“脸谱”用户在阿拉伯国家中排位第三，仅1100万突尼斯人中就有200万用户。受此次美国“以互联网为工具推进海外民主”战果的鼓舞，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于2011年2月15日发表了题为“互联网的对与错：互联网世界的选择与挑战”的讲话，号召全世界开放

互联网,近日美国又关闭“美国之音”对华广播,力求全力打造中文“推特”……可见,“将互联网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外交结合起来付诸实践”的美国互联网外交^[22]已成为中阿文明交往中面临的新挑战,美国新媒体在“7·5事件”和近日阿拉伯国家政治动荡中蓄意“催化”与“放大”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因此,中阿双方既要提高识别西方大国价值渗透与强权意识的分辨力,也要完善有关信息安全的防范技术,更要利用新媒体来争取自己的话语权,进而消除西方媒体对中阿人文交流与合作造成的干扰与破坏。

第三,双方都应将宗教交流作为深化中阿文明交往的突破口

周总理曾以宗教交流为突破口,借万隆会议成功谱就了新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友好交往的全新历史:他既促成了“巴勒斯坦问题”成为大会的重要决议,又促成了新中国穆斯林首次官方朝觐变为可能,结果赢得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与会者的普遍好感,特别是埃及总统纳赛尔会后就选派巴库里首次访华,叩开了新中国的外交大门,尤其是巴库里在回国后发表的《在中国人民的见闻》,被许多阿拉伯国家媒体争相转载,极大地影响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对新中国的态度与立场。可见,对宗教团体的思想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的充分发掘与和平利用,是对原有的世俗化场景下的外交模式的一种修正和更新。中阿宗教交流的历史事实证明,开展宗教交流的前提条件是“要坚持统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大局。一方面,我们应坚持尊重伊斯兰文明,尊重伊斯兰国家对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断发展双方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建立起牢固的、充满活力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中国国内的民族宗教问题中,处理好与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2000多万穆斯林的关系,一向占有很大的权重。”^[4]¹⁷鉴于中东复杂的人文现状,我国在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进行人文交流时,尤其要注意妥善处理宗教问题。而且,宗教交流既不受政治动荡与经济下滑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还能凭借其特殊的资源优势开展较为广泛的民间联络与沟通,并使得包括宗教交流在内的中国人文外交的作用与地位也因此突显。

[参考文献]

- [1] 彭树智. 文明交往论[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 [2] 江淳, 郭应德. 中阿关系史[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1.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局.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概览(1949~1991年)[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3.
- [4] 朱威烈. 试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性关系[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9).
- [5] 时延春.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阿关系//丝路盛开友谊花[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 [6] 马晓霖. 伊斯兰圣地朝觐面面观//丝路盛开友谊花[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 [7] 中国外交部亚非司.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文件汇编”[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 [8] 塞繆尔·亨廷顿.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 [9] 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 十字路口[M]. 朱威烈, 等, 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 [10] 亨利·基辛格. 一场战争可以使未来摆脱恐惧[N]. 每日电讯报, 2001-09-16.
- [11] 内藤正典本. 为了回避“文明的冲突”[N]. 东京新闻, 2001-09-25.
- [12] 阿拉伯人与大中东计划: 阿拉伯人如何面对挑战[N]. 生活报(沙特阿拉伯), 2004-05-31.
- [13] Hrair Dekmejian. Islam in Revolution: Fundamentalism in Arab World[M].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4] 杨青. 区域主义: 源起与研究[EB/OL]. [2004-05-18]. <http://www.southcn.com/nflr/lzm/200405190570.htm>.

- [15] 高祖贵.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5.
- [16] Simon W. Murden. Islam,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New Global Hegemony[M].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 [17] 张骥. 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8] 张铁南. 宗教知识小百科[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1991.
- [19] 忻华. 美国在中东走“险棋” [N]. 新民晚报, 2011-03-07.
- [20] 胡锦涛. 促进中东和平, 建设和谐世界[N]. 光明日报, 2006-04-24.
- [21] 吴冰冰. 从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的发展看“中阿合作论坛” [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1(1).
- [22] 青木. 希拉里再赌互联网外交[N]. 环球时报, 2011-02-17.

China-Arab States Civilization Exchange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MA Lirong

Abstract The last two millennia has witnessed the persistent China-Arab States civilization exchanges, which consist of both official and people-to-people channels. The exchanges reveal rich connotations and varied attributes. At the new era, the challenges facing Islamic civiliza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after “911” terrorist attacks of 2001, Arab-Islamic world is notorious, and Islamic civilization is at the crossroad. Second, the US Greater Middle East Initiative aims at reforming the Islamic world culturally, which has marginalized the latter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is still in dilemma in pursuing the way to integrate itself into globalization. Third, the Arab democratic movement is actually a movement for the mass to express their call for democracy, with the public squares instead of mosque as the central place. Such demonstration actually reveals the consciousness of Islamic civilization to integrate into globalization. To further promote China-Arab States civilization exchanges, the two sides should strengthen mutual understanding,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be on guard against the new challenges of internet politics by the US, and take religious exchanges as the new breakthrough to deepen China-Arab states civilization exchanges.

Key Words Civilization Exchanges; Chinese Civilization; Islamic Civilization; Public and Cultural Diplomacy;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 李 意)